

地理不棋、四、四。往。统。
 事个。北其东其地地的衰
 军一。盘河是山是腹要下兴
 的像棋、川。中为略天的
 代就国中四西汉原战到代
 古局的关和山和中大系朝
 国格范上南、北、九关、
 中理规盘东角湖边这往分



饶胜文
 著

布局天下

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

布局天下

责任编辑：陈济康

封面设计：张禹宾



ISBN 7-5065-4143-2



9 787506 541435 >

ISBN7-5065-4143-2/E·1891 定价：21.00元

此书荣获第五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饶胜文编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

ISBN 7-5065-4143-2

I. 布… II. 饶… III. 军事地理—研究—中国—古代 IV. E9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8262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瑞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6 年 5 月第 2 版 2006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A5 印张:10.125

字数:263 千字 印数:4001—8000 册

定价:21.00 元

序

瞿林东

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是一本历史军事地理著作。什么是历史军事地理？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认为：“军事地理学研究军事与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是人文地理的一个分支，也是军事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对指导军事行动具有重要意义。了解古代的军事地理是更好地认识当代军事地理的重要条件，因此，历史军事地理又是历史地理学，也是军事地理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篇章。”（史念海《河山集·四集·谭其骧教授序》）饶胜文同志的这本书所论，是关于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虽然不是对古代军事地理作详细的考察，但其性质是历史军事地理著作，自无疑义。

在中国古代历史遗产中，论军事地理大势者，代有所出。言兵，论政，说地，也都与此有所关联。从《孙子》十三篇，到贾谊《过秦论》；从诸葛亮《隆中对》，到杜佑《通典·兵典》；从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到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等，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从军事、政治、地理着眼，还是从某一局部的发展进退着眼，抑或是从总揽全局着眼，军事地理大势都是人们所关注的。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称：“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远古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

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圣后之所宜周览也。”李吉甫是中唐后期的一位名相，史家称他“该洽典经，详练故实”，“善任贤良”，乃“经纬之臣”（《旧唐书·李吉甫传》）。他说的上面这段话，包括了政治、军事、地理等几个方面的含义，具有典型的意义。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是中国古代军事地理的代表作，总揽“州郡之分合”，辨析“形势之重轻”是其所长；详论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所宜，以及兴亡得失成败之缘由，是其主旨，包含了丰富的知识和智慧，启迪后人思考者多矣。

本书作者之所以更多的受到前贤在这方面的启发，从而对考察古代军事地理大势产生兴趣，并非偶然。这是因为，作者在大学读历史系本科和攻读研究生时，有一个学术上的追求，即认为学习和研究历史，一是要知天下大势，一是要明历代兴亡。读史而有此旨趣，可谓立意高甚。这使我想到朱熹教导他的学生读史的方法：“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朱子语类》卷十一）可见，古今之人读史，自有相通的路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知天下大势，怎样才可明历代兴亡？作者寻觅到一个契机，即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这是因为作者在读史中逐渐认识到，政治兴亡常与军事成败相关，而地理又与军事密切相关，故探讨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对于深入认识中国历史上历代兴亡，实为一个重要关键。重要的是，这一研究领域，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有现实意义。这也可以看作是作者的治史宗旨吧。经数载之功，几十次修改、补充，作者终于把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把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形象地概括为“棋盘型格局”。全书内容亦由此而展开。因有“棋盘型”，乃有“四角”的分析，即关中、河北、东南、四川；乃有“四边”的阐述，即山西、山东、湖北、汉中；乃有关于“合天下之全势”的中原的认识。全书从地理形势、军事成败入手，最后落实到政治局面的变化，即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成因及其类型。概而言之，全书由地理而言

军事,由军事地理而论政治得失。这样一个结构,这么重要的内容,在这本二十多万字的著作中,不可能详加论述,只能是“布局”之梗概,“大势”之要略。尽管如此,作者在一些具体论述上还是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如其论河北攻守的三个层次,论湖北的三个重心,论汉中东西伸展的特点,以及论四川的攻守之稳固的形势,论东南何以形成保据之最佳态势,等等,都是根据古代军事态势、攻守得失以及前人所论而经过认真思考提出来的。作者用力之勤,于此可见一斑。以上两点,对于一位青年研究者来说是很难得的。

这里,我想说一点感受:史念海先生是当今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他的《河山集》第四集是研究历史军事地理的力作。他在这书的《自序》中对历史军事地理之学有精辟的论述,并强调“当前而欲论述历史军事地理,自须多方吸取前贤已经取得的成果,若求文献记载与实际地理形势相结合,就需要改弦更张,而不能墨守成规。”史先生的研究所得,大多是文献考订与实地考察结合的结果,故格外为世所重。谭其骧先生恳切说过:“我希望历史地理界的同志们,特别是具有足够学力的中青年同志们,都能够通过读《河山集》第四集,引起研究历史军事地理的兴趣,并学习筱苏(史念海先生字筱苏)文献整理与实地调查结合的治学方法。”老一代学者的教诲和希望,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文献整理,无疑需要多年的积累;实地调查,则需要有明确的目的和坚忍的毅力,二者都是科学工作,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不断地有所创获。我想,这也是本书作者的愿望吧。

我不治历史地理之学,对历史军事地理更未曾涉足。作者再三要我为本书的出版写几句话,盛意难却,于是写了上面这些或许是不不得要领的文字。

是为序。

2001年1月31日序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在德不在险”(代前言)

吴起事魏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龙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

在一本专门讨论军事地理的著作中，对于地理因素在政治兴衰和军事成败中的地位，自然会将其单独突现出来，作专门的强调。但这很可能会给人造成一种“地理决定论”的印象，似乎地理因素在政治兴衰和军事成败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在开始我们的探讨之前，我先引述吴起的这番话。归结底，“在德不在险”。决定政治兴衰和军事成败的根本性因素是政治、军事本身上的积极进取，而不是地理因素。三苗氏“德义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纣“修政不德”，虽有险固的山河，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运。

天下没有攻不破的险要。

潼关虽险，毕竟项羽曾入之，曹操曾入之，刘裕曾入之，安史叛

军亦曾入之。

瞿塘虽险，毕竟岑彭曾入之，桓温曾入之，朱龄石曾入之，刘光义曾入之，汤和曾入之。

剑阁虽险，毕竟邢峦曾入之，尉迟迥曾入之，郭崇韬曾入之，王全斌曾入之。

长江虽险，毕竟晋师曾渡之，隋师曾渡之，宋师曾渡之，元师又曾渡之。

“险可恃而不可恃也。”中国古人对于地理险要与政治兴亡的关系其实已有了比较科学的态度。险之不可恃，是因为决定政治兴亡的自有更为根本的因素，而非地理因素。得民心者兴，失民心者亡。勤修德政，自可怀敌附远，弥患于未萌。若不修德，则一舟之人尽为敌国。险之可恃，是在政治、军事上积极进取的前提下，因地设险，防患于未然。险之不可恃是在战略乃至政略层面上的，险之可恃是战术层面上的。

在政治兴亡和军事成败中，地理因素虽然重要，但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为避免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形成“地理决定论”的印象，特于开篇垂悬下先贤的这一明训：“在德不在险”。这是本书所有讨论及所有结论的总前提。

目 录

序	1
“在德不在险”(代前言)	1
第一章 棋盘型军事地理格局	1
第二章 四角的军事地理形势	16
第一节 山河四塞,百二秦关——关中	16
第二节 上游之势,临驭六合——河北	52
第三节 龙蟠虎踞,东南形胜——东南	87
第四节 山川险固,天府之土——四川	119
第三章 四边的军事地理形势	142
第一节 河东都会,用武之地——山西	142
第二节 依山凭河,战守之冲——山东	171
第三节 枢纽江汉,砥柱江南——湖北	198
第四节 南北胶着,东西伸展——汉中	236
第四章 中原的军事地理形势	249
第一节 合天下之全势	249
第二节 中原山川形势	254
第三节 对中原局势的判断与经营的得失	267
第四节 攻取洛阳的成功战例	273
第五节 中原地区东西之争与南北之争	279
第五章 统一与分裂	288
第一节 统一与分裂:政治与地理	288
第二节 统一与分裂:问题的转换	291
第三节 分裂的类型	301
第四节 统一的轨迹	308
后 记	314

第一章 棋盘型军事地理格局

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及为之上者，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多，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故胜负狐疑，须计数而定；下者，则守边隅，趋作罅，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不如。^[1]

中国古代军事地理格局乃是一种棋盘型格局。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地理格局就像一个不规范的围棋盘。在这个不规范的围棋盘上，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是其四边，中原为其中央腹地。

中国的地域虽然辽阔，但在历代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却主要是上述九大地域。大体上分布在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上。

这里所说的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是指在历代战争中，上述九大地域的重要性往往关系到天下的统一与分裂、关系到一朝一代的兴与衰，或者，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关系到中原政权的存与亡。

古人惯讲“山川都会”。一般说来，在那些既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又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的地方容易形成战略要地。

几列东西向的山河与几列南北向的山河纵横交错，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中国地势三级阶梯大体上呈东北—

西南向分布。其中，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的一系列山脉——北起燕山，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再转向鄂西、湘西山脉而接云贵高原——为中国的东、西部之间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南北之间也分出几个层次，其主要的分界线则为长江、黄河、淮河及秦巴山地，此外，中条山、大别山也起到了补充作用。

这几列纵横交错的山河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些地理单元的腹地一般都有一定的空间容量，外围有险要的山脉或者江河为之险阻；有大大小小的江河周流内外，既是这些地域内部流通的运输线，又将不同的区域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乃是区域之间战略关系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

山脉和江河的战略意义各不相同。山脉的意义重在阻隔，而贵在有孔道可以通行；河流的意义重在流通，而贵在有据点可以扼守。

一般说来，山地的断层地带或者江河源流穿切山岭所形成的河谷低地便于作为穿越山地的交通孔道。如关中四塞、太行八陉所扼通道及穿越秦巴山地的几条栈道便是如此。江河主要是作为人力、物力运输的交通线。以江河作为险阻，还须在那些重要渡口或支流与干流的交汇处建立据点，以确保对这些江河的控制。如黄河的孟津和蒲津渡口、长江的瓜洲渡和采石渡、淮河的颍口、涡口、泗口等处，便都伴随有重要军事据点的形成。

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则易于在纷乱的局面中建立根据地，形成局部的秩序，积蓄力量；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则便于向外部投递力量，便于向外扩展，也便于介入全局。上述九大战略要地大都拥有这些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九大战略要地并不全是按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来划分的，而主要是考虑到它们在军事地理的格局中以其地形、地势的原因构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它们在历代战争中也的确显示出了它们作为一个个独立单元的地位。其

中,关中主要是指陕西省的秦岭以北部分;汉中地区则因其相对独立,单独作为一个战略要地;东南主要指江苏、安徽两省的中南部;中原则主要指河南。其它几地则基本上同于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在称法上,关中和中原都沿用了古代的称法,因为这种称法本身就极富战略色彩。

在上述九大战略要地的外围,有一些地域山川形势也很险要,如岭南、闽南、浙江、辽东、河西等地。这些地域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地位也很重要;但由于位置的关系,这些地域险要的山川固然保护了自己,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它与外部的联系,妨碍了它对于全局的全面介入,因此在历代兴亡中,对于全局未能显示出决定性的意义。当然,近代以后,中国的国防形势发生变化,它们在军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也有所变化。

在这个棋盘型格局中,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分处其四角。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一般都有比较优越的山河形势,有相对稳固的后方和可以凭恃的山川险阻,能够保持一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态势;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足以供养、支撑起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易于形成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势力兴起之初,占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据地,从容经营,积累力量,为日后进取天下打下基础。

关中山河四塞,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崤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地势上,关中对东部平原地带呈高屋建瓴之势。关中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其地位重要者,有函谷关、武关、散关和萧关,控制着关中地区几个主要方向的出入通道。其中,函谷关扼崤函之险,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往来通道;武关控秦岭东段之险,扼守着关中南方向的进入通道;散关扼秦岭西端之险,控制着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交通咽喉;萧关扼陇山之险,守备着关中西北通道。四塞险固,

闭关可以自守,出关可以进取。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从而使关中具备一种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态势。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环抱,南面中原。燕山山脉起着抗击塞北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居庸关、山海关、松亭关、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关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脉的几条交通孔道。太行山脉为河北的右侧翼的重要屏障。紫荆关、倒马关、井陘关、滏口等关隘扼守穿越太行山脉的往来通道。在河北平原腹地地上有一些东西向的河流,如拒马河、滹沱河、漳河等,在中原政权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也能够加以利用,建立河防体系。对于由塞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地区与游牧经济的塞北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来自中原的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

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南北对抗,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下连吴越,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对抗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南方在长江沿线置列有一系列军事重镇,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古代长江下游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分处建康(今南京)的上下游。建康方面也加强对这两处渡口的防守。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分别有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北岸分别有广陵(今江苏扬州)和历阳(今安徽和县),都置兵戍守,立为重镇。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经营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战略意义。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南方在淮河一线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钟离(今安徽凤阳)和寿春(今安徽寿县),在淮东,主要是山阳(今江苏淮安)

和盱眙。寿春正对颍口(颍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颍河或淮河上游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涡河之冲。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水运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随着南北力量的消长变化,其攻守之势也随着而变化。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南北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前沿。

四川居长江流域的上游,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都是崇山峻岭,其防护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孔道。两个方向的往来孔道俱极险要。大抵东面为水路,行江道;北面为陆路,行栈道。这两个方向又分别归重于两大重心:重庆和成都。由重庆东出,经三峡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节(古夔州)为其门户,瞿塘关(亦称江关、捍关)即在此处;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大抵以剑阁为其门户,剑门关即在此处。在重庆与成都之间,又有几条江河水路相连通。

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四角地位得以形成,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条件,即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优越的自然条件。自然条件优越,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够储粮养兵,供养、支撑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古代河北的农业生产条件虽不如现在,但河北特别是河北北部拥有一种比较好的在内地与塞外之间、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进行贸易的条件。这种经济特色跟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的一个重要衔接地带的地位是相适应的。东南地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随着江南的开发和发展,到南朝时,在

《禹贡》中称为“厥田下下”的东南扬州地区已呈现出相当繁华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时起，东南财赋便为关中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必仰仗东南，也经营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四川盆地在历史上每被称为“天府之土”。四川腹地是长江及其众多支流冲积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里，宜于农业生产；加上四川及其周围地区物产丰富，因此，四川地区每被赞为“民殷国富”。

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业。但要统一天下，仅有地理条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才能整合出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是进取天下的社会基础。在分处四角的几大战略要地中，建立于关中和河北的政权都曾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历史上的全国性政权也大多定都于此二地；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对峙之局，而少有统一天下的（除明朝朱元璋外）；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多为割据政权，而没有一个政权曾统一过天下。究其根源，都可从这些政权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中探寻一二。

一个地域能否兴起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与这个地域的民风、社会文化特色及其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关中地近西戎，风俗劲勇，民皆习战；自商鞅变法，秦人以耕战为本，遗风流披，影响深远，形成了与东部地区迥然相异的社会风尚，秦汉时期即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2]的说法；北朝后期，鲜卑军事贵族与北方汉姓士族结合，形成集团势力——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统治的基础。河北自战国时起便一直是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河北劲悍习战民风的形成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自赵武灵王改制，胡服骑射，河北精兵，为天下雄。另一方面，河北的政权相当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游牧民族所建，这些生长、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骑射，是天生的战士，平时游牧

驰猎，战时出征打仗；而且，那些人据塞内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够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这样，新兴民族初起的锐气、游牧民族宜于征战的天性和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接受，几个方面相结合，所形成的力量至少在军事上令汉族人难与争锋。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这样，在东南地区与中原之间没有那种地方文化与中心文化区之间的差距。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遂构成东南政权的重要基础。在北方沦亡之后，乔迁到东南的政权大多能凭借这一点整合南方社会，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外，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潜在的武装力量。东晋时谢玄、刘裕曾率以屡破北方强敌的北府兵即是这种力量的显示。但另一方面，乔迁政权本身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所以，立足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四川的政权大多为客籍集团所建，客籍集团是他们割据四川时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客籍集团与四川本土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成为历代据蜀者一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掉了川中政权的内部力量。此外，四川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历代据蜀者易于养成一种政治上的“盆地心态”，安于偏霸，安于割据，不思进取。这大概是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从没有完成过统一天下大业的重要原因吧。

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分处四边。四边之地，一般也有比较险要的山河形势，但这些地域综合条件不如四角。它们都夹在两角之间，彼可以来，此可以往，既是双方联系的纽带，又是双方对抗时争夺的焦点。其地形特点也与它们的地位相符，既有供双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险要；而且，它们与中原之间有比较捷近的通道。兴起于四角的政治势力，要想摆脱割据一隅的偏霸局面，向外扩展，必先争两翼，控制夹该角的两边。